

• 社会史研究 •

## “书剑双美”:唐河朔藩镇的军事技能培养与文化教育 ——基于社会流动的视角

张天虹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089)

**摘 要:**中晚唐河朔藩镇在社会流动方面呈现出重才干而轻家世的趋势。河朔军事精英的才干是在河朔藩镇的政治、军事与文化环境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河朔藩镇的军事参与率高,军事训练受到重视,武艺精湛者往往从中脱颖而出。但武艺只是军事精英及其子弟维持其地位的一个方面,在内外压力之下,他们研习军事著作,接受文化教育,从而拓宽了社会流动的渠道。

**关键词:**唐代; 河朔藩镇; 军事技能培养; 文化教育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唐宋变革期河朔地域社会流动与变迁”(10YJC770120)

“唐宋变革”是中外史学界长久不衰的议题。回应这一问题,需要更加具体、微观的研究。“社会流动”(本文所谓的社会流动,是指个人、家庭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变动)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前辈学者虽未必都使用这样的概念,却已在解释唐宋历史变迁的过程中有所涉及。陈寅恪曾专门讨论了唐代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实际上就是处理了一个社会流动的问题。而且,他特别强调,安史之乱以后的唐统治之社会阶级的变迁,“可分为中央及藩镇两方叙述”<sup>①</sup>。地方社会的变迁,的确是历史宏观叙事的重要基础。而以往关于唐代河朔藩镇的研究的成果集中于河朔藩镇与唐廷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胡化与汉化等方面。<sup>②</sup>本文试图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关注藩镇统治下的河朔<sup>③</sup>地方社会人才培养问题。<sup>④</sup>

### 一、河朔藩镇社会流动中的才干与家世

唐代,原有的以自然血缘为纽带的门第观念有所消退,却仍然保持着影响。因此,到唐代后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

② 参见张天虹《唐代藩镇研究模式的总结和再思考——以河朔藩镇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55-65页。

③ 这里的“河朔”是指广义上的黄河以北的地区,但限于材料的不均衡性,在本文中,主要是指魏博、成德、幽州三镇(这三镇被认为是割据性最强的藩镇),也部分涉及易定、横海等河朔地区的藩镇。

④ 学术界在唐代教育史方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第367-424页);刘海峰《唐代乡村学校与教育的普及》(《教育评论》1990年第2期,第61-63页);宋大川《唐代教育体制研究》(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周谷平《敦煌出土文书与唐代教育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59-64页)。这些研究成果对我有很大启发。但是就这些成果所引用的史料而言,涉及河朔地区的似乎还比较少。

期,累世公卿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而且他们一旦在朝为官,往往因缘表里,互相提携,形成比较封闭的社会关系网络。<sup>①</sup>李德裕则直接宣称: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sup>②</sup>在河朔藩镇,这种重家世的倾向也不时地有所显露。“地望”、<sup>③</sup>“门望”<sup>④</sup>以及是否为“名家子”<sup>⑤</sup>,也都是河朔藩镇节度使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参考。

然而,河朔藩镇的节度使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内外压力,他们用人看重家世,但更需要处理藩镇内外纷繁事务的人才。既有家世背景又具才干之人是藩帅的首选。所以,郑濬(746-792)<sup>⑥</sup>“以才地称,释褐奏授沧州长芦县尉”。<sup>⑦</sup>“才地”是才能和门第的合称。即便将“谏墓”的因素考虑进来,这也至少说明:才干在河朔政治精英攀登社会阶梯的过程中的作用已经逐渐凸显了。此后,郑濬多次升迁,“当道节度使王公表荐充节度巡官”。<sup>⑧</sup>这里的王公当指王武俊,<sup>⑨</sup>他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大约同一时期,王武俊还试图拔擢现场作《射鸭歌》的刘言史,<sup>⑩</sup>足见其对真才实学之重视。所以,曹彦约(1157-1228)说“唐藩镇固是弊法,而其识拔名士,尚仿佛三代举选本意。固有士行修于家,而辟命达于朝。出而赞戎幕者,多奇才。入而居王官者,多宿望”,<sup>⑪</sup>肯定了藩镇在选贤举能方面的作用。

就推动社会流动中家世和才干因素而言,河朔藩镇从上到下,似乎越来越向重才干而轻家世的方向发展。藩帅选人方面如此,藩帅自身的继承方面更是如此。“河朔故事”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于强调河朔藩镇节度使“父死子继”。<sup>⑫</sup>这一“故事”是以强调血统的面貌出现。但是,在魏博、幽州等镇,真正实现这一“故事”的家族,比例并不高。<sup>⑬</sup>比较成功地实现了“河朔故事”的成德镇王庭凑家族,也如履薄冰,在节度使的继承问题上丝毫不敢有所懈怠。<sup>⑭</sup>

既然才干在河朔藩镇的社会升降变迁中日益重要,那么,它们又是在怎样的环境中造就和锻炼出来的呢?

- ① 以范阳卢氏为例,《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刑部郎中上柱国范阳卢府君墓志铭并序》记载“卢氏自北魏著为望姓,从高祖曾祖诸父兄弟时所谓清名者,相继在朝,因缘表里,二台两掖,卢氏之亲过半。”(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大中〇六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99页)
- ② 《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69页。
- ③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贞元一一八,第1923-1924页。
- ④ 《唐张佑明墓志》,侯璐主编《保定出土墓志选注》,石家庄: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 ⑤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大和〇六六,第2144页。
- ⑥ 郑濬与妻子博陵崔氏的合祔墓志称郑濬卒于贞元十二年(796年)(参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大和〇四九,第2130页)。
- ⑦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贞元一一〇,第1917页。
- ⑧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贞元一一〇,第1917页。
- ⑨ 王武俊782-801年为成德镇节度使,从郑濬的生卒年来看,则知其是供职于王武俊执掌成德节钺期间。
- ⑩ 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六《刘言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新1版,第697页。
- ⑪ 曹彦约《昌谷集》卷一五《江西安抚司机宜厅壁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67册,第188页。
- ⑫ 关于“河朔故事”的含义,笔者曾将其总结为节度使的继承原则、相对独立的自治原则以及模糊的上下尊卑关系三个方面(参见张天虹《“河朔故事”再认识:社会流动视野下的考察——以中晚唐五代初期为中心》(以下简称《“河朔故事”再认识》),严耀中主编《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4-241页)。
- ⑬ 参见张天虹《“河朔故事”再认识》,严耀中主编《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第194-241页。
- ⑭ 参见张天虹《“河朔故事”再认识》,严耀中主编《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第194-241页。

## 二、河朔藩镇的从军风气与军事技能

“自中原始兵革之虞，河朔为用武之地。”<sup>①</sup>我们还可以使用河朔各镇的人口中从事军事活动的人员比率即军事参与率(Military Participation Ratio)<sup>②</sup>来大致衡量那里从军的普遍性。据开成年间的度支王彦威报告“长庆户口凡三百三十五万，而兵额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一兵。”<sup>③</sup>以往使用这条材料多在说明养兵的负担问题。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它也反映了唐代长庆年间(821—824)全民参与军事活动的整体情况。大致推算，河朔诸藩镇的军事参与率高于这个水平。

笔者曾将河朔藩镇的两百年(763—960)历史大致分成三个阶段。<sup>④</sup>其中属于唐代的部分(763—907)，可以以河朔再叛的长庆元年(821)为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大体上，前一阶段唐廷与河朔藩镇之间的战争相对激烈，河朔藩镇的相对独立局面基本得到确定；后一阶段，唐廷放弃了武力攻伐河朔藩镇的努力，双方基本处于相安无事的局面。<sup>⑤</sup>然而无论处于哪一个时期，河朔藩镇所面临的军事压力并未缩小，因此必须维持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

杨志玖和张国刚曾经根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户数及其他材料所载兵数列成一表，现转引如下：

表1 唐代部分藩镇户兵比例表

镇别	户数	兵数	户：兵	兵数出处
魏博	74 498	70 000	1.1：1	《旧唐书》卷一二七《洪经纶传》
成德	63 604	50 000	1.3：1	《旧唐书》卷一四四《阳惠元传》
武宁	37 251	30 000	1.2：1	《全唐文》卷七一六《使院新修石幢记》
泽潞	26 059	20 000	1.3：1	《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真传》
淮西	12 867	50 000	0.3：1	《新唐书》卷二一四《吴元济传》

资料来源：杨志玖、张国刚《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再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学术月刊》1982年第6期，第49页。

必须指出，在表1中，户数和兵数的统计时间并不能保持一致，因此，相关的结论也只具有参考性。河朔军人中有一部分是安史余部，但绝大部分来自本镇管内州县的编户。魏博节度使田承嗣“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sup>⑥</sup>大乱之后的魏博地区，虽然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但是仍有很大一部分编户出丁从军。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天祐二年(906年)诛杀牙军，“时宿于牙城者千余人，迟明尽诛之，凡八千家，皆赤其族，州城为之一空”。<sup>⑦</sup>这说明魏州城的居民差不多家家有人从军，所以才会出现“州城为之一空”的情形。此外，魏博镇还有

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七《宣慰魏博诏》，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11页。

② 军事参与率简作M. P. R. (参见Stanislav Andreski,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 Berk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33)。

③ 《旧唐书》卷一五七《王彦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57页。

④ 张天虹《河北藩镇时期的社会流动——以763—914年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8年，第23页。

⑤ 黄巢起义以后，全国藩镇格局发生变化，河朔藩镇受到来自李克用和朱全忠两个集团的挤压，但直到914—915年前后，李存勖控制河朔各镇，河朔藩镇尚能够维持相对的独立性。

⑥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第3838页。

⑦ 《旧五代史》卷一四《罗绍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89页。

山河子弟<sup>①</sup>、乡兵<sup>②</sup>等后备力量,实际的军事参与率也应高于表中的数字。

据《旧唐书·李宝臣传》记载,宝应二年时,李宝臣“有恒、定、易、赵、深、冀六州之地,后又得沧州步卒五万、马五千匹”<sup>③</sup>。从“后”、“又得”等字推断,成德军的实际数量似乎应该大于5万人。至于幽州镇,在安史之乱后期,那里便是“家家自有军人”<sup>④</sup>。安史之乱以后,幽州镇频繁介入朝廷与河朔诸镇的战争。天祐三年,朱全忠自将攻沧州之时,幽州节度使刘仁恭“悉发男子十五以上为兵”,使得“卢龙闾里为空,得众二十万”。<sup>⑤</sup>这是一种极端情况,在此前相对平稳的9世纪中,幽州镇军队的人数固然会小于20万,但考虑到其与北部奚、回鹘等族时有战事,<sup>⑥</sup>似乎其境内的军事参与率应该也不会太低。

而且,幽州镇从军之人来源特别广,其中多有弃文从武的。蔡雄(735-787)童稚之岁,“习经史,蕴韬略”,待河朔藩镇初步建立之后,他“投笔攘袂,来游蓟门,获前连帅朱公上宾待之,署幽州卢龙节度押牙”。<sup>⑦</sup>王时邕(799-846)的祖父王解公、父亲王杲都以儒为业,五经及第受官,<sup>⑧</sup>王时邕本人弱冠“辞田园,赴春闱”,中进士,但最终仍然“知剋(克)禄燕地,从仕军门。首署佩刀之职,浸成高位”。<sup>⑨</sup>韩宗穗(830-879)“尤深慕彼班超。所以文笔竞投,武功思立”,“乃擢自良家,致之近卫”。<sup>⑩</sup>“良家”<sup>⑪</sup>子弟出身的韩宗穗弃文从武,成为幽州镇的亲帐兵马使。<sup>⑫</sup>

甚至还有商人被吸纳到幽州镇的军人队伍中来。姚季仙(787-863)因“偶内货实驰务而产于蓟门,即为幽州人也”。结果,“会昌中,故太尉相国清河张庄公察以说直,忠不近名,一命主戢。以军令严毅,不敢再辞。释褐署节度驱使官”。<sup>⑬</sup>

较高的军事参与率意味着河朔藩镇并非仅仅依靠“父子相袭、亲党胶固”<sup>⑭</sup>的职业军人集团,必然是“每有出师,起良家子弟”<sup>⑮</sup>,从而使得河朔藩镇的职业军人集团在保持比较稳定的代际传承性的同时,也会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陈子龙(1608-1647)曾总结军令畅通的根本保障在于“将者,贤于人者也。大将者,贤于诸将者也。……是以为将者必有一二事可以震服群下之心,然后令之而必从,诛之而不怨”。<sup>⑯</sup>以

① 参见孙继民主编《河北新发现石刻题记与隋唐史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② 据《旧唐书》卷一八二《诸葛爽传》记载,魏博节度使韩简欲夺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之地,曾率领魏博乡兵八万随牙兵一起出征(第4702页)。

③ 《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第3866页。

④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上元二年三月条胡注引《蓟门纪乱》,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111页。

⑤ 《新唐书》卷二一二《藩镇卢龙·刘仁恭传》,第5987页。

⑥ 贞元十一年(795)四月,“幽州刘济奏大破奚王囁刺等六万余众”(《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下》,第381页);大和四年,奚寇边,李载义“以兵击走之”(《旧唐书》卷一八〇《李载义传》,第4674页);会昌年间,回鹘扰边,幽州节度使张仲武“遣其弟仲至与裨将游奉寰、王如清等率锐兵三万人大破之”(《旧唐书》卷一八〇《张仲武传》,第4677-4678页)。可见幽州对外战事频繁。

⑦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元〇七四,第788页。

⑧ 参见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会昌〇三〇,第966页。

⑨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会昌〇三〇,第966页。

⑩ 参见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卷壹》第三五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下册,第28页。

⑪ “良人”在这里是指他没有官宦的家世背景。

⑫ 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卷壹》第三五号,下册,第28页。

⑬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〇二五,第1052页。

⑭ 《旧唐书》卷一八一《罗弘信附子(绍)威传》,第4692页。

⑮ 贾纬《大晋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赠秘书监博平郡马公(文操)神道碑铭并序》,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六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⑯ 陈子龙《安雅堂稿》卷九《武经论·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则阵已定矣》,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第554页。

军人集团为支柱的河朔藩镇,固然也要讲究内部的等级和服从,但上至藩帅下至各级将校也必须具有足够的才干,方能从这个集团中脱颖而出,树立自己的威权。其中,军事方面的才能和技艺,可谓“震服群下之心”的重要手段。陈寅恪对河朔藩镇的军将有一段精辟的总结:“要而言之,家世或本身曾留居河朔及长于骑射二事则大体相类,斯实河朔地域之胡化演变所致者也。”<sup>①</sup>陈氏将河朔藩镇当作一个种族文化问题来加以理解,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一种人文关怀。<sup>②</sup>骑射是北方游牧少数民族的强项,对中原地区的军事活动有重大影响,然而,河朔地区的骑射风尚却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为完全是胡化所致。骑射作为一项重要的军事技能,是在长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斗争中培养出来的。弓弩能够远距离地杀伤敌人,在冷兵器时代所具有的特殊优越性是其其他近身武器所不能比拟的。<sup>③</sup>所以,先秦两汉时开始,习射就在军事训练中受到重视。在汉代的都试中,射箭就是一项重要的考评指标。<sup>④</sup>

在唐朝的军队编制中大量配置了使用弓弩的部队。<sup>⑤</sup>唐前期,府兵“其居常则皆习射,唱大角歌。番集之日,府官率而课试”。<sup>⑥</sup>可见,唐朝对军队中的习射训练有一套包含考核在内的完整制度。安史之乱平定之后,为对付河朔三镇,唐廷设置了泽潞镇控扼山东。大历十二年,李抱真领怀泽潞留后。他“密揣山东当有变,上党且当兵冲,是时乘战余之地,土瘠赋重,人益困,无以养军士。籍户丁男,三选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令之曰‘农之隙,则分曹角射;岁终,吾当会试。’及期,按簿而征之,都试以示赏罚,复命之如初。比三年,则皆善射”。<sup>⑦</sup>所谓“角射”,按胡三省注,当是一种军事竞赛。<sup>⑧</sup>泽潞镇面临的主要敌人是河朔藩镇,李抱真加强射箭方面的训练,部分原因可能是迫于河朔地区军事压力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措施。同时,他的这项举措也会对与之相邻的河朔地区产生影响,迫使河朔诸军也必须提高其战斗力。因此在博弈的过程中,河朔藩镇和邻镇都会狠抓部队的军事训练,尤其重视习射。

在唐后期(763-907)的大部分时间里,从军队的绝对数量对比来看,河朔藩镇不敌唐廷。因此,河朔诸镇必须重视军队作战素质的提高,“完器甲以彰有备,训卒伍以示有严”。<sup>⑨</sup>

魏博镇“军中尝分曹习射”。<sup>⑩</sup>而《资治通鉴》则记载魏博军“尝于车中角射”。<sup>⑪</sup>综合这两条记载,魏博镇中当有比较规律的习射训练,一种是静态的分曹习射,还有类似于运动射击的“车中角射”,进而达到提高全军弓弩射杀水平的目的。

安史之乱后期,史朝义杀史思明之后幽州城内的权力争夺战可展示幽州地区习射水平:“战斗皆在坊市间巷间,但两敌相向,不入人家剽劫一物,盖家家自有军人之故,又百姓至于儿童,皆闲习弓矢,以此无虞。”<sup>⑫</sup>在幽州镇,习射几乎成了人人必备的一项安身立命的技能。我们不排除这里有胡化因子的作用,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家家自有军人”。在浓厚的军事氛围之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第204页。

② 参见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3页。

③ 这是就其射远的特点而言的。在战斗中,弓弩部队同样需要持其他兵器的军士的配合,否则难以发挥战斗力。

④ 参见武普照、王忠君《先秦两汉的习射风气》,《山东师大学报》1989年第6期,第34-39页。

⑤ 参见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四《器械篇第四十一》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43册,第99-100页。

⑥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第1834页。

⑦ 《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真传》,第3647页。

⑧ 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八年正月条胡注,第7699页。

⑨ 纥干潜《赠太尉韩允忠神道碑》,《全唐文》卷八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册,第8557页。

⑩ 《新唐书》卷一四八《田弘正传》,第4784页。

⑪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八年正月条,第7699页。

⑫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上元二年三月条胡注引《蓟门纪乱》,第7111页。

下老幼闲习弓矢,军民合一,习射也就有了更为广泛的训练基础。

除习射外,河朔藩镇中还常有其他一些带有军事训练和拔擢军事人才性质的活动。

一“角觝”。《事物纪原》载“今相扑也”,<sup>①</sup>即摔跤运动,是军中较力的主要项目之一。幽州李载义“有勇力,善挽强角觝,刘济为幽州节度使,见而伟之,致于亲军,从征伐”。<sup>②</sup>幽州军中当有“角觝”,正是在这样的比赛中,李载义才可能为刘济发现,受到提拔。

二“击鞠”。“击鞠”是一种打马球的运动,在军事上,具有锻炼骑兵策马作战的技能技巧、反应能力以及模仿骑兵作战的作用。幽州节度使“[李]载义延中使击鞠,志诚亦与焉,遂于鞠场叫呼谋乱”。<sup>③</sup>可见,幽州镇有固定的“鞠场”。

此外,适度的“田猎”也是一种军事上的训练和展现军人才干的机会。成德节度使王武俊“尝与宾客猎,一日射鸡兔九十五”。<sup>④</sup>

河朔藩镇的这种氛围往往使得武艺娴熟之人脱颖而出。要在河朔藩镇成为出色的军事人才,大多“及乎攻武,便得穿杨”。<sup>⑤</sup>登上节度使之位以前的田弘正在魏博镇的“车中角射”中,“一军莫及”。<sup>⑥</sup>镇守成德镇乐寿的大将傅良弼“以射冠军中”。<sup>⑦</sup>王武俊“一日射鸡兔九十五”的战果,也使得“观者骇伏”。<sup>⑧</sup>幽州李载义,不论其是否确为皇室之后,<sup>⑨</sup>但是他“有勇力,善挽强角觝”,<sup>⑩</sup>引起刘济的注意,开始了其社会阶梯的攀登。

此外,长期的军旅生涯还能培养出人的干练作风。《方镇编年》载“魏博田承嗣签治文案如同流水,吏人私相谓曰‘世罕有此旋风笔也。’”<sup>⑪</sup>田承嗣的这种高效办公模式,恐怕与其长期的军旅生涯不无关系。

相反,河朔藩镇军人集团的“统治阶级”,<sup>⑫</sup>尤其是藩帅,如果缺少军中历练,则往往难以长久。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之子李惟岳,在继任节度使之前只有文散官衔,<sup>⑬</sup>没有军中经历,最终未能取得军人的支持,失位丧命。<sup>⑭</sup>大中十一年(857)八月,<sup>⑮</sup>成德节度使王绍鼎弥留之际,也未传位给其幼子王景崇,而是传给其同母弟王绍懿。原因之一恐怕也在于王景崇年幼,没有军中的历

① 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博弈嬉戏·角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92页。

② 《旧唐书》卷一八〇《李载义传》,第4674页。

③ 《旧唐书》卷一八〇《杨志诚传》,第4675页。

④ 《新唐书》卷二一一《藩镇镇冀传·王武俊传》,第5955页。

⑤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元和〇六一,第1991页。

⑥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八年正月条,第7699页。

⑦ 《新唐书》卷一四八《牛元翼附傅良弼传》,第4789页。

⑧ 《新唐书》卷二一一《藩镇镇冀传·王武俊传》,第5955页。

⑨ 《旧唐书》卷一八〇《李载义传》称其为“常山愍王之后”(第4674页),《新唐书》卷二一二《藩镇卢龙·李载义传》则在“常山愍王之后”加上了“自称”(第5978页),所以,李载义的身份待考。

⑩ 《旧唐书》卷一八〇《李载义传》,第4674页。

⑪ 冯贽编《云仙散录》一四四《旋风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6页。

⑫ 这里的“统治阶级”借用陈寅恪在《唐代政治述论稿》中的上篇标题“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因此这里的“阶级”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阶级”,而是指在河朔藩镇体制下拥有身份的政治和军事精英。

⑬ 《李宝臣纪功碑》碑阴有“仆射男中大夫试太常(下缺)□□岳,朝议大夫试鸿胪卿李惟(下缺)(上缺)殿中(缺)惟诚(上缺)左金吾卫(下缺)军(下缺)(上缺)卫兵曹参军李□□,试大理评事李(下缺)”。沈涛据《旧唐书·李宝臣传》指出:“考诸人当是宝臣子弟,所云仆射即宝臣也”。据此不但李惟岳只有文散官衔,李宝臣其余诸子也大多只有文散官衔(参见沈涛《常山贞石志》卷一〇,《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地方类,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2版,第18册,第13326、13330页)。

⑭ 李宝臣诸子普遍缺乏军中历练,可能是其家族最终为王武俊家族所取代的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张建宁已在《从〈李宝臣纪功碑〉看成德军的早期发育》(李鸿宾主著《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7页)中有所提及,今不敢掠美,特此注明。

⑮ 《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本纪下》,第638页。

练。王绍懿任节度使期间,王景崇在成德军中得到锻炼,担任都知兵马使<sup>①</sup>,为其日后担任节度使做了充分准备。魏博镇田承嗣临终之际,“虑诸子不任军政”<sup>②</sup>,而是以军旅经验丰富的从子田悦为帅。所以,父死子继意义上的“河朔故事”从一开始就没能得到严格的执行。<sup>③</sup>

相比之下,唐廷的有效控制区则似乎还没有形成如此浓厚的习武氛围。<sup>④</sup>

武艺精湛,尤其是精于骑射是河朔藩镇诸军的优势,也是其能够经常取得局部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础。然而,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包括陈寅恪在内的很多学者依据杜牧撰写的《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认为河朔地区的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sup>⑤</sup>“攻守战斗之事”不但需要河朔藩镇的藩帅与将校有勇猛强悍的作风和精湛的军事技艺,还需要他们具备一定的军事谋略和统筹全局的政治头脑。因此,河朔藩镇的将帅一般对军事著作比较感兴趣,并加以认真研读。

河朔藩镇涌现了不少精通兵法的将领。魏博镇邢曹俊“老而多智,颇知兵法”。<sup>⑥</sup>田弘正“少习儒书,颇通兵法”。<sup>⑦</sup>已出土的河朔藩镇时期的墓志、碑刻经常对墓主(或墓主的亲属等)有如下描述“幼习军书”、<sup>⑧</sup>“洞晓武经”<sup>⑨</sup>、“最好孙吴术”、<sup>⑩</sup>“读黄石书”<sup>⑪</sup>、“十五诵三略”<sup>⑫</sup>、“能习礼容,又闲兵法”<sup>⑬</sup>、“好读兵书”<sup>⑭</sup>,意在说明墓主重视军事经典著作的研读。其中,《唐故平州刺史卢龙节度留后周府君墓志铭并序》详细记载了墓主周玕(787-856)“十岁诵孙吴兵书十多万言。弱冠又著长城集十三篇,藏于家。大略集古之名将得时为长城也”。<sup>⑮</sup>墓主是否真的十岁能背诵兵书,弱冠之年便完成皇皇巨著,尚不可确定无疑。然而,这却可以反映出河朔藩镇的将帅们特别注重学习历史上的军事经验,希望能为己所用。

### 三、河朔藩镇的文化教育

河朔地区原本是儒家文化的中心之一,读书在民间有久远的传统,由下层流动上来的武人希望接受文化教育,亦在情理之中,因此他们的语言习尚原本就不可能只是攻守战斗之事。从河朔藩镇军事精英的代际流动情况来看,由文入武和以武改文都比较常见。

前文已经提到,河朔藩镇的将帅们很注重研习兵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就已接触到文字,

① 参见《旧唐书》卷一四二《王廷凑附绍鼎子景崇传》,第3890页。

②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附子绪传》,第3845页。

③ 参见张天虹《“河朔故事”再认识》,严耀中主编《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第194-241页。

④ 天宝年间以来,唐廷出于各种原因,似乎还有意控制人们的习武风气,宣布“习弓矢者有罪”,对于坊曲习射,多次要求“宜令禁断”(《唐会要》卷七二《军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300、1301页)。游离于中央政令之外的河朔地区似乎应该较少地受到此条管制的影响。近日与Nick Tackett教授交谈中得知他正在利用大量墓志资料做一项关于唐后期精英阶层的研究,长安、洛阳地区(尤其是洛阳)的精英多以从文为主。

⑤ 杜牧《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樊川文集》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44页。

⑥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附侄悦传》,第3842页。

⑦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弘正传》,第3848页。

⑧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大中〇二六,第2270页。

⑨ 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壹》第一四三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下册,第107页。

⑩ 吴睦《唐赠左散骑常侍汝南韩公(国昌)神道碑》,《全唐文》卷八〇五,第9册,第8470页。

⑪ 吴睦《唐赠左散骑常侍汝南韩公(国昌)神道碑》,《全唐文》卷八〇五,第9册,第8470页。

⑫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历〇二九,第711页。

⑬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大历〇五一,第1793页。

⑭ 纥干潜《赠太尉韩允忠神道碑》,《全唐文》卷八一三,第9册,第8555页。

⑮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〇五六,第1009-1010页。

并进而接触到除兵法之外的多方面知识,其中尤可注意者,乃是河朔藩镇的将帅军校对《春秋》及《春秋三传》尤其是《左氏春秋》的阅读有着一种偏好:

魏博节度使田弘正“颇好儒书,尤通史氏,《左传》、《国史》,知其大略”。<sup>①</sup>

成德军节度使宅务专当官赵公亮(841—884)“幼攻左氏之书,长擅右军之笔”。<sup>②</sup>

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少业《左氏春秋》,擲笔为蓟北雄武军使”。<sup>③</sup>

“唐乾符末,范阳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学。”<sup>④</sup>

“张希崇,字德峰,幽州蓟县人也。……少通《左氏春秋》,复癖于吟咏。天祐中,……希崇乃擲笔以自效。(刘)守光纳之,渐升为裨将。”<sup>⑤</sup>

《春秋》一书,在安史之乱以后受到不少武人的喜爱。甚至连浑瑊家奴出身的高固,在“有膂力,善骑射”的同时,也“好读《左氏春秋》”。他的姓名“高固”便是“取《左氏传》高固之名也”。<sup>⑥</sup>可见《左氏春秋》流传甚广。但为何此书在河朔地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安史之乱后的河朔藩镇,相对独立性很强,尤其是河朔三镇在第一阶段(763—821)时常与唐廷处于对峙的状态。建中二年(781),王武俊斩杀李惟岳,成为成德节度使,幽州节度使朱滔攻下深州。但是朝廷以王武俊为恒州刺史,又以李宝臣故将康日知为深赵两州观察使。“是以武俊怨赏功在日知下,朱滔怨不得深州,二将有憾于朝廷。”<sup>⑦</sup>这时,与马燧、李抱真军激战数月之久的魏博军,已经奄奄一息。魏博节度使田悦洞察到朱滔是可以利用的对象,于是派人游说朱滔以唇亡齿寒之理:

若魏博全,则燕、赵无患,田尚书必以死报恩义。合从连衡,救灾恤患,《春秋》之义也。春秋时诸侯有危者,桓公不能救则耻之。今司徒声振宇宙,雄略命世,救邻之急,非徒立义,且有利也。尚书以贝州奉司徒,命某送孔目,惟司徒熟计之。<sup>⑧</sup>

朱滔“欣然从之”,<sup>⑨</sup>于是率军救助魏博镇。《宋公(俨)墓志铭并序》的撰者站在幽州镇的立场上记载了这次“救危济困”的战争经过:

建中二年七月出蓟城,奉恩命,元戎朱公我神将,府君宋公亲领甲兵,收掌恒定,围深州,剋伏。其年十一月破恒定节度张惟岳兵十万余人,积尸遍野,收聚尸骸,埋筑丘冢。何期国家负德,不与功勋,反祸燕师,授太原河东节度马遂恶奏,先领朔方兵甲,陇右道李怀光领秦兵及殿前兵马同廿余万,吞营魏、博御河西侧。我幽州节度并以恒冀兵马,建中三年三月,离深州至魏贝,相去秦兵十里屯营,鼙鼓烈阵,弓矢相交。六月卅日,破马遂兵马廿余万,积尸遍野,血流御河。<sup>⑩</sup>

此方墓铭撰者认为幽州镇在讨平李惟岳之乱时付出巨大代价,但唐廷在处置成德镇旧土的问题

①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弘正传》,第3850页。

② 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壹》第一三九号,下册,第104页。

③ 《旧唐书》卷一八〇《张仲武传》,第4677页。

④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三《李全忠芦生三节》,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74页。

⑤ 《旧五代史》卷八八《张希崇传》,第1147页。

⑥ 《旧唐书》卷一五二《高固传》,第4077页。

⑦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附悦传》,第3843页。

⑧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附悦传》,第3843页。

⑨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附悦传》,第3843页。

⑩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建中〇一八,第1833页。



上对幽州镇不公,因此幽州军队反戈与唐廷军队作战。作者在志文中称己方为“燕师”,而本来代表“王师”的朔方军竟然被称为“秦兵”!此外,对于“秦兵”的一败涂地,作者丝毫没有隐晦和曲笔,或许还夸大了幽州军的战果。

这样一来,河朔三镇与唐廷之间的关系就被理解成了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关系。唐廷甚至还不能被比附成“周”而只能被称为与“燕赵魏”并列的“秦”。于是朱滔和王武俊合兵援救魏博的田悦,就合乎了所谓“《春秋》之义”。换言之,《春秋》之义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河朔三镇对抗朝廷的理论武器。

《春秋左传》本身的内容,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议题。也许,这里的“《春秋》之义”被田悦或田悦的僚佐歪曲了,或者是田氏(及其僚佐)的牵强附会。不过《春秋左传》的内容确实十分丰富,至少包含很多春秋时期的经典战例,也包括很多处理诸侯之间以及诸侯与周天子关系的经验。而当时的河朔三镇所面临的局势和春秋时期大国争霸的局面庶几相近,正如宋代罗大经所指出,“唐之藩镇,犹春秋之诸侯也”。<sup>①</sup>而且,《春秋》之义还可以作为激发士兵忠诚的宣传和教育资源。河朔藩镇军乱频繁,节度使也在试图用思想武器致力于构建稳定的统治秩序,即“学,所以知君臣父子之义者”。<sup>②</sup>会昌元年九月,幽州军乱,陈行泰杀节帅史元忠,结果陈行泰又被次将张绛所杀,局势陷入混乱。李德裕指责幽州军士,“取舍之间,苍黄骤变。且举棋不定,《春秋》所讥,远近闻之,莫不嗤笑”。<sup>③</sup>李德裕或许比较了解一向标榜奉行“《春秋》之义”的河朔藩镇,所以会以“《春秋》所讥”来讽喻幽州将士。

简而言之,河朔藩镇的将校从《春秋》以及《春秋左传》中汲取对他们有益的资源。因此,即便从“攻守战斗之事”的立场出发,河朔藩镇的将校们也有学习和阅读《春秋左传》的内在动力和外在于压力。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春秋》又是一部儒家经典。这样一来,河朔藩镇的武人们,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接触了儒书,从而成为了他们在文化方面继续前行的基础。

因此,墓志中对墓主的文化修养的记述似乎不应被完全理解成“谀墓”:

幽州大将李顺通妻张氏(787-848)之父张光烈,“为人忠孝诚名,书剑双美,……特佐燕邦,……补充衙前之职”。<sup>④</sup>

幽州镇的曹府君(780-847)“幼习典彰(章),久闲军旅”<sup>⑤</sup>,“为将则海内无尘,处文则决胜千里”。<sup>⑥</sup>

幽州镇节度押衙韩宗穗(829-879)“文武俱才,负雋彦双略。得卞庄之剑术,游孔圣之学源”。<sup>⑦</sup>

易定镇的曹弘立(805-864)“幼□诗书,长闲韬略,文可以经济,武可以匡时”。<sup>⑧</sup>

这几个人物大都是出自幽州镇,以往认为幽州镇的胡化现象最严重,以武质为主。毛汉光就曾认为,镇州暨滹沱河一线乃是安史之乱后河朔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分界线,在此以北

① 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诸侯藩镇”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1页。

② 韦稔《涿州新置文宣王庙碑》,《全唐文》卷四八〇,第5册,第4905页。

③ 李德裕《李德裕文集校笺》,卷八《代苻澈与幽州大将书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

④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〇一八,第981-982页。

⑤ 此处释文据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四辑,西安:三秦出版社,第181页。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〇〇八误将“军旅”释作“军振”。图版参见张宁等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京卷》第二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

⑥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〇〇八,第974-975页。

⑦ 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卷壹》第三五号,下册,第28页。

⑧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咸通〇九二,第2450页。

之幽、易其人以武质为主。此线以南,虽然政治上是强藩统治,在军事上职业军人是最有力量者,但社会上仍有若干士人,而士族家庭亦不失家学家风。<sup>①</sup>从上面所引的材料来看,实际的情况或许未必如此。“处文”是河朔地区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尚武”则是河朔地区的固有风尚和特定军事、政治形势下的必然选择。虽然这些墓志中可能会存在谀墓的现象,墓主不一定真的就是文武全才,但至少表明,文武并重是河朔藩镇政治和军事精英们的一种追求和努力。读书与习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一种关系。对于已经“投笔从戎”的军人家族来说,其子弟向“从文业儒”的方向转化,已经不存在太高的门槛。事实上,河朔藩镇的武将子弟在文和武两个方向上自由发展。

据《大唐故河间郡刘公合祔墓志铭并序》记载,墓主刘仲(818-864)的曾祖刘华“志高威猛,好习弓裘,曾定难边,方分忧阃外,因兹竭节,累历荣班,日往月来,授幽州永安军使”,<sup>②</sup>已是幽州镇的军事将领。而刘仲的祖父刘谅“家唯一身,业攻三传,精研道义,十赴礼闱,果遂前心,选得沧州平原县令”,<sup>③</sup>开始业儒了。刘仲之父的情况,在志文上没有明确记载。刘仲本人则“幼习儒风,苦辛云水”,<sup>④</sup>继续向“文”的方向发展。

魏博节度故步军左厢都知兵马使米文辩(793-848),长子米存遇为经略副使,次子米存简则为“兼节度要籍、兼词令官”,<sup>⑤</sup>向文职发展。而且米氏的墓志上还说明,其诸子“皆学习礼经,以期乡秀”。<sup>⑥</sup>显然,米氏对子孙的文化素质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成德军节度押衙兼御史中丞端公知衙前都虞侯马良(810-883)的墓志上,其子嗣的名字磨灭不清,无法辨认。虽然子承父业,“始命节度子弟”,“授步军右胜武将事”,“又命知左武锐将事。旋又命为知左鼓角将”。<sup>⑦</sup>但是其子嗣“幼亲诗礼,长习箕裘,武略滋身,攻修剋备”,<sup>⑧</sup>显然也有了文化方面的追求。

易州镇也有类似的情况。据《唐易州上谷郡故罗府君(亮)墓志铭》,墓主罗亮(834-897)的祖父“洞晓武经”,父亲“效节从军”,墓志上没有记载罗亮的结衔,可能不仕。他的长子罗元实任易州军里的判官,已经有半文半武的转化,孙子罗师琼、罗师诰、罗师礼、罗师严等,“并始学鲁书,即之鸿渐”。<sup>⑨</sup>可见,武将子弟的文质教育可能在逐步深化。

在幽州镇,幽州节度衙前讨击副使温令绶(805-874),他的两个儿子向文武两个方向发展,长子温景修“署节度要籍,幼而雅默,长习儒书”,<sup>⑩</sup>次子温景衡“孝悌知名,谦恭立节,弯弧学剑,颇有佳声”。<sup>⑪</sup>

上面所举的这些材料,在时间上看,大都属于第二阶段(822-907)。说明长庆二年以后,这种文武并重的趋势更加明显了。随着朝廷逐渐承认了河朔地区的半独立状态,河朔诸镇内部斗争更趋激烈。史称,河朔藩镇内部父子、兄弟、将帅之间“迭相屠灭,以成风俗”。<sup>⑫</sup>在这种情况下

① 参见毛汉光《论安史乱后河北地区之社会与文化——举在籍大士族为例》,淡江大学中文系编《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第99-111页。

②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光启〇〇一,第1150页。

③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光启〇〇一,第1150页。

④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光启〇〇一,第1150页。

⑤ 孙继民主编《河北新发现石刻题记与隋唐史研究》,第60页。

⑥ 孙继民主编《河北新发现石刻题记与隋唐史研究》,第60页。

⑦ 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壹》第一三八号,下册,第104页。

⑧ 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壹》第一三八号,下册,第104页。

⑨ 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壹》第一四三号,下册,第107-108页。

⑩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一〇二,第1114页。

⑪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一〇二,第1114-1115页。

⑫ 《旧唐书》卷一四三《李全略传》附“史臣曰”,第3908页。

下,河朔藩帅除了树立自己威权之外,更希望通过文化教育确立其割据政权存在的理论依据,更希望在藩镇内部塑造一个明尊卑、守秩序的氛围。所以他们对于开设学校、进行教育,也都表现得比较积极。<sup>①</sup>

但是,晚唐以前,知识教育资源往往为世家大族垄断,社会中下阶层入学以及得书都很困难。<sup>②</sup>且据毛汉光研究,河朔地区虽有若干士族家庭亦不失家学家风,<sup>③</sup>但河北大士族著支向两京一带迁移的迹象却最为明显。<sup>④</sup>在这种情况下,河朔藩镇的教育资源如何而来?

事实上,自安史之乱结束那一刻开始,河朔地区和唐廷顺地<sup>⑤</sup>的文化往来就从未中断过。从家世和出身两方面看,北走河朔的士人范围甚广,<sup>⑥</sup>士人北走河朔“盖是当日社会之常情,而非变态”<sup>⑦</sup>。

柳宗元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中指出“今燕、魏、赵、代之间,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缘饰政令。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sup>⑧</sup>北走河朔的除了士人之外,还有僧侣。柳宗元认为即将赴河朔的文畅上人,将“统合儒释”。<sup>⑨</sup>寺观在唐后期私学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sup>⑩</sup>河朔藩帅大多崇佛尊道,<sup>⑪</sup>所以寺观在河朔的文化教育中似乎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当日社会虽然得书困难,但随着雕版印刷的逐渐推广和商品经济的活跃,这种情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sup>⑫</sup>元稹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sup>⑬</sup>著名文人的诗文也还有多种灵活的传播渠道。“开成中物价至微。村路卖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绡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一首兼与之。”<sup>⑭</sup>通过这种买一赠一的乡间贸易,白居易的诗文便不胫而走。河朔与江淮

① 魏博节度使韩允忠(814-874)“立乡校以劝学,敦儒术而奖善”(纥干潜《赠太尉韩允忠神道碑》,《全唐文》卷八一三,第9册,第8557页);事实上,长庆二年以前,这种教育也受到节度使重视。幽州节度使刘济就曾立孔庙以加强教化(韦稳《涿州新置文宣王庙碑》,《全唐文》卷四八〇,第5册,第4904-4905页)。

② 参见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之际社会转变研究之一》,《唐宋史论丛》,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第221-229页。

③ 参见毛汉光《论安史乱后河北地区之社会与文化——举在籍大士族为例》,淡江大学中文系编《晚唐的社会与文化》,第99-111页。

④ 参见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30-332页。

⑤ 唐朝把遵守朝廷政令的地区称作“顺地”。李翱(772-836)称“及贞元季年,虽顺地节将死,多即军中取行军副使将校以授之节,习以成故矣。”(李翱撰《故正义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李文公集》卷一一,《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59册,第48页)。

⑥ 参见张天虹《从新刊唐代〈李仲昌墓志铭〉看安史之乱后士人“北走河朔”》,《河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130-136页。

⑦ 陈寅恪《唐代政治述论稿》上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第189页。

⑧ 《柳宗元集》卷二五《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68页。

⑨ 《柳宗元集》卷二五《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第669页。

⑩ 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唐史研究丛稿》,第367-424页。

⑪ 幽州镇将帅对佛教尊崇可以从房山石经题记中窥见一般。此外,魏博节度使和成德节度使对于寺院的建设与修复的支持,对高僧的礼遇,对于宗教的虔诚也屡见记载(参见封演《魏州开元寺新建三门楼碑》,《文苑英华》卷八六三,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6册,第4553-4455页;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〇四〇,第1066页,《旧五代史》卷五四《王镒传》,第725-731页等)。

⑫ 孙国栋曾指出,晚唐时代,社会上的书籍已经不聚于故家大族,而是开始向安史之乱以后兴起的武臣聚集(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之际社会转变研究之一》,《唐宋史论丛》,第257页)。但对于这一过程仍需加以讨论。

⑬ 《元稹集》卷五一《白氏长庆集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55页。

⑭ 《云仙散录》一四六《胡绡半尺》引《丰年录》,第47页。引文中“;”作“;”似更妥。

既有贸易上之往来,<sup>①</sup>似乎亦当有书籍北流至河朔。而仕于河朔的士人也收藏书籍,甚至自有著述。华封舆(788-846)十六岁举进士。“有才无时,三上不第”。<sup>②</sup>因其母在幽州,故而来投,<sup>③</sup>历事节度使刘济、刘总、朱克融、李载义、杨志诚、史元忠、张仲武。并“著文集十卷,百行之源,教化之端,历历在其中矣”。<sup>④</sup>蓟州刺史张建章(806-866)“聚书至万卷,所居有书楼”,<sup>⑤</sup>而且还将自己出使渤海国的经历著成《渤海记》。<sup>⑥</sup>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的门客为其著《沂公史例》十卷。<sup>⑦</sup>田弘正还“乐闻前代忠孝立功之事,于府舍起书楼,聚书万余卷”。<sup>⑧</sup>魏博节度使罗绍威也曾“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sup>⑨</sup>在这种背景下,河朔藩镇的藩帅、将校逐渐有了更多获得书籍的机会。

## 四、余 论

在河朔藩镇,与家世背景相比,才干越来越成为进入军事精英集团的主要因素。河朔地区的军事参与率普遍较高,而这些才干是在河朔藩镇的政治、军事与文化环境中得到培养和造就的。习射、角抵、击鞠都是河朔藩镇生活不可或缺的活动,也是一种绝好的军事技能训练,技艺精湛者往往从中脱颖而出,成为军人集团中的精英。武艺只是军事精英及其子弟维持其地位的一个方面,在内外压力之下,他们研习军事著作,接受文化教育,从而拓宽了社会流动的渠道。河朔藩镇的精英中既有人弃文从武,也有人由武改文。这种转换有时在一代之内完成,有时则在代际之间实现,甚至还有复合型人才的出现。中晚唐五代宋初的历史发展,其结果是“关中本位”最终为“河北优势”所取代。<sup>⑩</sup>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在位期间先后十三次到“玉津园”、“迎春苑”宴射或阅诸军骑射,<sup>⑪</sup>甚至希望文臣也能有强悍的武艺,<sup>⑫</sup>是其崇尚武艺的不时流露;而同时“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sup>⑬</sup>诚如邓小南所说“在宋太祖的心目中,理想的人才状态似乎是武将懂文治,而文臣通武干。”<sup>⑭</sup>联系中晚唐以来河朔藩镇的历史事实,出身于河朔军人世家的宋太祖表现出这种倾向,或许可以从更为广泛的历史背景中得到解释。

(责任编辑 朱剑)

- ① 晚唐时代,“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买易往来者”(《太平广记》卷四九九《郭使君》引《南楚新闻》,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097页)。
- ② 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卷壹》第二九号,下册,第22页。
- ③ 参见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卷壹》第二九号,下册,第22页。
- ④ 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卷壹》第二九号,下册,第22页。
- ⑤ 《北梦琐言》卷一三《张建章泛海遇仙》,第276页。
- ⑥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中和〇〇七,第2511页。按,此方墓志所载张建章曾出使渤海的经历与《北梦琐言》所记相合,故知其为同一人。
- ⑦ 参见《旧唐书》卷一四一《田弘正传》,第3850页。
- ⑧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弘正传》,第3850页。
- ⑨ 《旧五代史》卷一四《罗绍威传》,第191页。
- ⑩ 据毛汉光研究,五代时期,经历了河南集团、河东集团和河北集团的较量和竞争,河北优势渐次形成(参见毛汉光《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418-474页);据何冠环统计,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籍贯可考的武官共757人,其中河北籍军官259人,占34.21%,为各省之冠。何冠环所指的河北系以今日中国行政区划的河北省,若以本文所界定的“河朔”地区来计,则此数值当更高(何冠环《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北宋统治阶层的社会流动现象新探》,《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3年,第1-23页)。
- ⑪ 参见《宋史》卷一一三《礼志十六·嘉礼四·游观》,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95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至一七,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 ⑫ “王嗣宗,……太祖时举进士,与赵昌言争状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结果王嗣宗胜,宋太祖以王嗣宗为状元(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王嗣宗》,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7页)。
- ⑬ 《宋史》卷一《太祖本纪一》,第11页。
- ⑭ 邓小南《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第53页。

## On the Identity and Positioning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Studies: A Case Study of *Tian-ren-he-yi* (Union of Heaven and Man)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LIU Xiao-gan

Chinese philosophy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since the 20th century with reference to Western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alytic methodology, and disciplinary requirements. This new identity radically conflicts with the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way in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of Confucianism, Daoism, and Buddhism, the three major fields of Chinese philosophy. Facing the conflicts,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have become necessary and critical. The arguments of this article are based on investigation into and analyses of the usa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popular idiomatic theme *Tian-ren-he-yi* (a compromised translation: Union of Heaven and Man) from the 11th to the 19th centuries and since the 1980s. Discoveries from the research reveal the hidden agendas and positions of scholars, ancient and modern, behind the intensive divergence in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theme *Tian-ren-he-yi*. Among all the divergences, the most fundamental one is that scholars discuss or use the theme for different purposes, such as revealing the possible original meaning in ancient contexts, or providing useful ideas for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needs. These are the two orientations or approache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other fundamental divergence is that, how scholars actually define the theme and related materials: Do they take them as an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or as sources for practical consideration and purpose? These are the two positionings of research materials. We believe that researchers'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two orientations and two positionings are crucial to the advancement of the academic quality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studies.

## Introducing *Gongfu* into Philosophy

NI Pei-min

A dilemma underneath the question of "the legitimac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s that in order to squeeze it into the narrow framework of the mainstream Western philosophy, it will lose its uniqueness, and yet in order to retain its uniqueness, it will be kept outside of philosophy. The only way to break the spell is to let the resourc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legislating" philosophy. The concept of *gongfu*, which Song-Ming neo-Confucians frequently use, contains rich layers of meaning that effectively brings human practice together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 and the methods of cultivation, and can thereby shed lights on two major blind spots of the mainstream Western philosophy: that, because of its preoccupation with gaining propositional truth, it overlooks practical guidance, and that, because it conceives humans as essentially choice-makers, it overlooks self-transformation. The concept of *gongfu* can stimulat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in three ways: It can be used as a philosophical approach or perspective, help define an area of philosophical study — the philosophy of *gongfu*, and potentially lead to a series of *gongfu* theories such as *gongfu* ethics.

## Martial Arts Training and Cultural Education in Heshuo *Fanzhen*: A Study in Perspective of Social Mobility

ZHANG Tian-hong

Capabilities and abilities tended to be more evaluated than family background in Heshuo *Fanzhen*, a governmental system involving administration through regional governors, during the

mid-late Tang Dynasty. The military elites in Heshuo *Fanzhen* were brought up in specific political , military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Due to frequent military operations , martial training wa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re , and out stand those good at martial arts , which are nevertheless only one part of their capital to sustain their social status as military elites. Consequently , they had more military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education to widen their channel of social mobility.

### **Social Marginalization in Late-Qing-Dynasty Southern Jiangxi Province: Analysis of Its Social Situation before Agrarian Revolution**

*HUANG Wei-ying , HUANG Zhi-fan*

In late-Qing Dynasty , three marked social phenomena were foun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Jiangxi Province: its social moral was deplorably corrupted with rampant gambling and stealing; the secret societies went unchecked , with many common people involved in; and in some areas , powerful clans turned to become tongs of bandits. Due to the above mentioned , the society there took on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marginalized. Marginalization can be understood as follows: it may refer to the inner marginalization of the society within this region , and to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its politics and economy by the late-Qing Dynasty. The society of banditry stayed unchanged eve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society of this kind was neglected by the ruling class , thus a hotbed of revolution.

### **Conflict Avoidance: Malfunctions , Sources , and Solutions**

*ZHANG Xue-zhi , WEI Xin*

Conflict avoidance , though frequent in organizations here in China , fails to settle conflicts effectively. Rather , it casts negative effects on interactions and teamwork among insiders. Conflict avoidance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types: structural and process. While the former originates from structural barriers in organizations , the latter is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cultural values mediated by individuals' negative anticipations of the outcomes of directly dealing with conflicts. There are several solutions that may weaken the tendency of conflict avoidance. Decentralize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would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that result in structural conflict avoidance , and process conflict avoidance would be ameliorated by decreasing negative anticipations. For one thing , perspective taking reduces misperception bias between the involved parties that exaggerates individuals' negative anticipations. For the other , open to discussion norm and management openness build up favorable climates that undermine the effect of cultural values on negative anticipations. These approaches promote organization members to resolve conflict in a more direct way , and ultimately contribute to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creativity.

### **Economic Risks Control and Legislative Principles for China's Economic Criminal Law**

*WEI Chang-dong*

Risks are the challenges humanity must face universally. Economic risks are not only strong enemies of the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 but also destructive elements leading to social risks. The prevention of economic risks entail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nomic rules of legal system , which includes of course the economic criminal law. The improvement of legisl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criminal law takes as its prerequisite the legislative guiding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nature. At present , it is imperative to base the legisl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criminal law on such dimensions as limits , control and effectiveness.